



邹涛 著

美国华人商文学：

跨文明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得电子科技大学200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海外华裔文学研究”（项目编号为ZYGX2009J125）的资助

美国华人商文学：

跨文明比较研究

邹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华人商文学:跨文明比较研究/邹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61-1629-6

I. ①美… II. ①邹… III. ①华人文学—对比研究
—美国 IV.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19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侯玲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28 千字
定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美国华人文学及其研究概述	(17)
第一节 美国华人文学的发展轨迹	(17)
第二节 美国华人文学的研究现状	(25)
第三节 美国华人商文学概述	(32)
第四节 小结	(39)
第二章 美国华人商文学与传统文化	(41)
第一节 “文以载道”的美学观	(41)
第二节 美国华人商文学对传统价值的演绎	(48)
第三节 圣人之道:中国文化的理念价值	(67)
第四节 圣人之道与古今华商命运	(74)
第五节 小结	(90)
第三章 美国华人商文学与美国商精神	(93)
第一节 美国商业文化与超人之道	(93)
第二节 自由资本主义商人精神的诗性弘扬	(108)
第三节 小结	(127)

第四章 华商形象的身份认同与华人的现代性历程	(129)
第一节 身份认同理论	(129)
第二节 坚守传统,自我强化	(131)
第三节 颠覆传统,倾心他者	(138)
第四节 东西徨顾,价值解构	(144)
第五节 跨越族裔,价值重构	(153)
第六节 小结	(158)
第五章 文明冲突还是文化融合?	(161)
第一节 自我、他者的越界与流变的族裔文化属性	(162)
第二节 跨文化的情缘:文化间的零距离接触	(175)
第三节 文化融合的误区:阴魂不散的东方主义	(180)
第四节 中美文化融合的理想模式:亦圣亦超人	(193)
第五节 小结	(202)
第六章 商文学与现代性困境:物质繁华背后的精神迷思	(205)
第一节 “先富后教”	(206)
第二节 商人的精神迷思与弥漫不散的悲剧感	(211)
第三节 “教”之路	(223)
第四节 小结	(235)
结语	(237)
主要参考书目	(243)
后记	(259)

绪 论

一 研究背景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① 先辈哲人一语道破天机，以闪电劈开乌云、劲风撕破蛛网的气势，穿透各种温情面纱，直刺当今社会现实。这是一个无法再蔑视物质的时代。现代西方人凭借发达的物质文明而成为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已经将“物质”置换为“精神”，把物质文明的相对落后等同于精神上的贫弱枯乏、急需指导和拯救，帝国主义就因而有了堂而皇之推行的理由。抓住物质的主导权成了掌握话语权利、实现精神自由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恪守清贫、只求精神的生存模式失去了由来已久的赞叹和仰慕，也难以带来心灵的平静和满足。

商人群体是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先锋队，现代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环顾世局，要提高国力，并不需要枪弹大炮冲锋陷阵。利用经济力量，最能够立竿见影。”^② 这是著名印尼华商李文正的一段名言。纵观近五六百年间的西方历史，曾先后崛起的西方大国如

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0册，第3256页。

② 徐东民、叶宇：《海外华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都是靠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使国力迅速强盛起来的。新的时代呼唤新的英雄，在今天这个商业时代，以物质成功为直接目的的商人群体就此站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代替以往的武将、主教、知识精英等成为新的时代英雄。活跃在经济领域中心的商人群体，尤其是那些跨越多种文化、率先受到多种文化合力作用的商人群体，对于我们审视现代性、更好地把握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商人一直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一群人，在数千年封建小农经济和重农轻商倾向的阴影下，在国力式微的尴尬与屈辱中，他们的奋斗与抗争倍显艰苦和悲壮。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不过，他们又碰到了现代性的难题与挑战，即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张力中站稳脚跟不被淘汰，抓住机遇走向世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在这些问题上，海外华商群体的生存经验与文化历程为国内的商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个群体处于中华民族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前沿阵地，他们的奋斗轨迹与心路历程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范本，向我们展示出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如何进行碰撞、冲突与融合的种种图景，对于帮助我们应对不同文化相遇之时的火花飞溅，扬利避害，做到兼收并蓄而又不迷失自我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而且，海外华商群体庞大的规模、广泛的分布^①、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②使其在世界全球化发展中极具典型性，他们的发展历程对预示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进程也颇具典型意义。

商人走上历史的前台，商场成为没有硝烟的广阔战场，为现代社会的成就与问题搭建出绝佳的时代展台。如何揭示、规避现代性之弊而张扬其

① 参见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印《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1997年第5期，《华侨华人资料》2000年第4期。

② [美]约翰·亚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蔣文译，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大挑战——21世纪的指南针》，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利，不仅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也是现当代所有深具人文关怀意识的作家们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文学创作者——生活最为敏感的“摄影师”，自然会对商场这个时代展台以及展台上的主角进行多方位的照摄。于是商文学（以描写商业或商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相应兴盛起来，文学长廊中出现了一批鲜活的商人形象。他们承载着作者对人性的洞察、对现代性进程的深刻反思。

对海外华商群体的生存际遇和发展历程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海外华人群体自身。因为国内出国潮流的经久不衰，海外生活始终是能引起国内读者浓厚兴趣的一个话题；又因为中国的日渐强盛、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海外华商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西方各国也满怀好奇地想了解华人的内心世界，这就为海外华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远离祖国和文化家园的海外华人，在异质文化的张力中对生活、对人生、对文化满怀感悟，于是产生了不能不发的内在的创作冲动。内外因素合力作用下，造就了今天的海外华人文学的繁荣景象。在流动过程中，海外华人对富足生活的追求一直是他们所有梦想中的首要核心内容。因为，对于身处文化夹缝中的海外华人来说，物质上的保障是一切的基础，必须首先有物质的保障和支撑，他们才有可能在湍急的水流中站稳脚跟，在异质文化里建立自身的精神领地。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在海外华人文学中，海外华人的经济活动或商路历程成为叙述的重要内容，在这些作品或诗意或朴实的叙述中，一个个鲜活的华商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可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却忽视了华商这一形象群体。有鉴于此，本书将重点考察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华商形象。

海外华商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在北美又以美国为最多。因为北美华商面临的文化差异比东南亚华商更大，那么他们在展现文化的互补互动、冲突与融合方面也更为突出、更具典型性；同时，美国的多元文化氛围为华人文学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作为第一世界强国中的第三

世界力量，美国华人在追求“美国梦”的过程中相对曲折的文化之旅也刺激了其言说欲望和创作冲动，于是美国华人文学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海外华人文学的重镇。美国华人文学言说的内容自然跟他们的寻梦历程密切相关，“美国梦”的核心内容是“财富梦”，美国华人商文学也相应兴盛。所以，本书将聚焦于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华商形象，探讨这一形象群体如何折射、预示海外华人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历程，以及作者如何对现代性的普遍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或提供了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对当前的世界文化格局与走向又有些什么启示。

二 术语梳理及界定

下面对本书涉及的一些关键术语进行简单界说。“海外”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指中国国家主权域外，所以不包括港澳台三地。这里的“华人文学”指具有华族血统的人（包括华侨、华裔、华人）用华文以及移居国语言作为表达工具创作的、其内容主要反映海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华人文学”界定的主要依据是创作主体的华族血统，而学界通常所说的“华文文学”则主要是从创作所使用的语言来界定，那么那些不具备华族血统的人用中文进行的创作就只可算做“华文文学”，却不能归入“华人文学”。

“商人”指以买卖或经营为职业的人，包括现代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华商”是指有华裔血统的商人。因为本书强调跨文明差异，鉴于中国大陆比起港澳台三地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少，所以研究范围基本限定于美国华人文学中来自大陆的在美华商形象，相应作品的作者也往往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华侨及其下一代。钱超英指出，在研究华人流散现象时不能笼而统之，而要在族群内部作出细分，“即依据华人移民中间那些在移民时段、来源地社会制度、国际经历和价值信仰等方面有类似背景的群体从抽象整一的华人集合中分辨出来，以提供一个观察华人移民流散

具体机理的可分析的结构，方便分析他们身份追求的方式”^①。本书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来自大陆的在美华商形象，也是基于这一考虑。

“商文学”指以描写商业或商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这一提法是笔者在综合已有的相关术语的基础上、再结合本书的重点提出来的，与已有的“经济小说”、“财经文学”、“儒商文学”、“商贾小说”等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小说”指一切围绕经济题材为中心的小说，不单指商业。“财经文学”则聚焦于现代经济，尤其是其中的金融业。香港梁凤仪所创作的很多财经小说曾引起财经文学热。“儒商文学”这一提法主要源自暨南大学的潘亚暎先生，包括“儒商写”——由儒商作家创作的作品，以及“写儒商”——以儒商为描写对象的作品。^②邱绍雄的《中国商贾小说史》则确立了“商贾小说”这一提法，指“以商人为主人公、以商人经商求利活动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说”^③，本书的“商文学”概念基本借鉴于他。“经济小说”的提法过于宽泛；“儒商文学”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道德价值评判色彩，况且在当代社会什么是“儒商”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商贾小说”中的“商贾”这一术语的中国古代色彩过于浓厚，综合以上考虑，本书将使用“商文学”这一新提法，它涵盖了已往的“财经文学”以及“商贾小说”的范围。

三 研究现状述评

因为商人作为新的时代英雄站在了社会舞台的前面，商文学的创作及其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当香港梁凤仪笔下的香港商业风云逐渐淡去的时候，大陆的商文学开始风起云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显感觉到，

^① 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② 潘亚暎：《世界看好儒商和儒商文学——写在第三届世界儒商大会之前》，《海内与海外》2000年第10期。

^③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在市场上流行的通俗小说中，商文学占的比例快速增大，哪怕是言情小说也纷纷以商场为背景。近年来更是出现非常多的商战电视剧，如《商界》、《龙票》、《东方商人》、《胡雪岩》、《大清药王》、《钱王》、《大染房》、《天下第一楼》、《背叛》、《白银谷》、《昌晋源票号》、《乔家大院》，等等。现在，《圈子圈套》、《青瓷》、《灰商》、《输赢》等商小说正在热销当中，每本的销量基本都在5万册以上，有些还超过了10万册。^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学术性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介入商文学的出版，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圈子圈套》、《圈套玄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输赢》、《破冰》等，这说明商文学的价值在经过市场验证后，又逐渐得到主流文化圈的认可。

但是，在我国，相关研究还主要散见于各种小论文当中。到目前为止，比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商文学的还只有三部专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两部），即邵毅平的《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和《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书是分十多个主题加以论述，而后者则是以史的形式按照时代先后来阐述，但每一个时期则细分多个主题展开，前书的主要内容基本融进了后一本中。邵毅平的著作把史料梳理和主题研究相结合，有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透视古代商文学。其遗憾之处在于主题的划分有些散乱，各主题之间有不少重叠交叉，分类层次上缺乏一种逻辑顺序。还有一本是邱绍雄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它则完全是按传统文学史的写法来编排的，对社会背景、作家、作品内容加以一一介绍，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此书只限于对小说体裁的梳理。

在时间分野上，邵毅平的研究限定在古代文学，邱绍雄的梳理止于近代小说。对中国现当代商文学而言，除了一些小论文，还没有任何系统性的研究与梳理。但是，本书对这项工作也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其原因主要

^① 颜彦：《实战财经小说打动读者》，2006年8月17日，www.sinobook.com.cn。

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现当代商文学多聚焦于近代以来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艰难奋斗的中国商人群体，他们区别于以往商人形象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夹裹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潮流之中而产生的，而从这一点上来讲，海外华商形象更能凸显其相关特征，从全球语境的角度讲也更具典型意义。其二，本书的研究范式是比较文学跨文明比较研究，意在追根溯源地挖掘中美文化的差异性与互补性，相比于受西方现代性影响较大的近代以来的商人群体而言，古代商人更能凸显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再加上篇幅、时间、精力的限制，本书在论述中国商文学时仍主要放在现当代文学以前的商文学作品上。在探讨中国商文学特点时，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抓住其根本的文化特征——道德寓言性，以线串珠地展开论述。

在美国，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商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的兴盛也相应比中国早。有些大学甚至已开设了商文学课程，如菲尼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就在网上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开了商文学（Business Literature）这门课。^① 美国有名的商文学作品如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刘易斯的《巴比特》（1920）、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1912）、《巨人》（1914）、《斯多葛》（未完成）、帕索斯的《大钱》（1936）等。在研究方面，代表性的论文如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的《小说中的商人》（1948）、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寻找资本主义英雄：美国小说中的商人》（1964）。^② 代表性的专著包括泰勒（Walter Fuller Taylor）的《美国经济小说》（1942）^③、麦克塔格（Michael J. McTague）的《文学中的商人：从但丁

^① <http://www.elearners.com/course/40170.htm>。2007年1月10日。

^② Henry Nash Smith, "The Search for a Capitalist Hero: Businessmen in American Fiction", *The Business Establishment*, Earl F. Cheit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4, pp. 77-112.

^③ Walter Fuller Taylor, *The Economic Novel i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2.

到梅尔维尔》(1979)^①以及瓦茨(Emily Stipes Watts)的《美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1982)^②。列文1999年在爱荷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现代主义商人:1864—1939年英美文学中的经济犹太人》也于2003年获得出版。^③该书主要研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对犹太人的经济成就的文学呈现以及现代反犹太主义的经济因素背后的政治宗教因素。前面的那些研究论著仍以史料梳理为主。瓦茨的《美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则跟邵毅平的《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一样,以主题研究的范式分十余个主题加以论述。本书在论及美国商文学时聚焦其关键的文化特征,主要探讨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商精神。

国内外关于海外华人商文学的研究非常稀少。与此关联最为紧密的研究要算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儒商研究和儒商文学研究。儒商和儒商文学研究随着十几次世界性的儒商大会而推动起来。首届世界儒商大会于1994年7月26—31日在海口召开,海内外有百余位儒商和儒商作家与会,会议名称是“首届国际儒商暨儒商文学研讨会”,这是极具开创性的文商结合的范例,不仅掀起儒商新风,促使华商学者化、儒商化,而且推动了海外华人文学的蓬勃发展。这次会议还成立了国际儒商学会,潘亚暾为创会会长。前面提到,“儒商文学”这一提法主要源自潘亚暾先生。他在研究台港海外华文文学时发现了儒商和儒商文学这一现象,于1984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针对海外华商积极进行文学创作的状况提出“16字诀”——“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强调这是曲线救文振兴中华之道。有人讥笑潘先生的“儒商文学”是“铜臭文学”,认为其“16字诀”

① Michael J. McTague, *The Businessman in Literature: Dante to Melville*. New York: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9.

② Emily Stipes Watts, *The Businessma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2.

③ Gary Martin Levine, *The Merchant of Modernism: The Economic Jew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1864—1939*,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3.

“非学者之论”，但笑骂由人的潘先生经过十年探索，写成《儒商文学论稿》，于1994年7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儒商座谈会上分发讨论。首届国际儒商暨儒商文学研讨会也正是在潘先生的倡议、策划下得以胜利召开。大会关于儒商文学的论文有云里风的《漫谈儒商文学》、汪义生的《儒商文学新走向》、费勇的《关于儒商文学及其评论》、张世君的《浅谈西方儒商文学传统》和王列耀的《意识的多层与儒商文学在当代的必然》等。^①1993年，北京文界为陈瑞献、吴正、周颖南等儒商作家分别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北大的季羨林先生场场登台讲话，称赞他们一手拿算盘一手拿笔杆，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这在文界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2004年，国际儒商学会十周年庆典暨首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在广州举行。十余年来这种华商与华文结合的会议方式大大推动了“儒商学”的发展。^②作为儒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商文学研究体现出敏锐的时代意识，顺应了现代人希望摆脱现代性困境、实现物质与精神并举的时代诉求。不过，儒商文学的相关研究还处在漫谈、随感层面，缺乏深层次的、系统的阐述。但是，儒商文学研究造成的声势与影响为商文学的研究与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这实在要感谢前辈们敏锐的时代嗅觉与敢于创新的勇气。相信到现在，至少不会有人再讥笑本书提出的“商文学”为“铜臭文学”了。

四 研究方法

本书的整体架构采用比较文学中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方法。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帮助人们认识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其

^① 潘亚瞰：《世界看好儒商和儒商文学——写在第三届世界儒商大会之前》，《海内与海外》2000年第10期。

^② 毛艳姣、王学峰：《国际儒商学会举行十年庆典暨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中国新闻网，2004年11月28日。<http://news.sina.com.cn/c/2004-11-28/22314372821s.shtml>。

最终的旨归则是希望尽可能减少全球化过程中异质文化间激烈碰撞的可能性，努力促成多种文化在彼此了解、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互补互动、和谐交融，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具体言之，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跨文明比较研究不同于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强调同源性、类同性的研究范式，而是重在挖掘、凸显文化间的差异性、异质性。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进行的研究实质上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比较文学研究，强调同源性和类同性的这种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在西方文明内部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但在当今这个异质文化交汇的时代，再试图在同一种文明圈的基础上建构世界文学的普遍规律不仅已不可能，还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事实上，文明内部之间的比较研究带来的是区域性，而世界性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不同文明间的比较之上。中国等东方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参与推动着世界比较文学界重视异质文明之间的文学比较问题。在跨文明比较研究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虽然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为数众多，但文明的异质性形成的深层差异往往更具有决定性。文明间文化与文学的隔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对于类同性的无知，而在于异质性的被遮蔽。有鉴于此，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把对不同文明之间文学异质性的探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表面上看，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对异质性的强调与比较文学寻找文学普遍规律的旨归相矛盾。其实，凸显异质性正在于彰显民族文学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正是探求普遍性文学规律的基础。没有对彼此相异性的相互了解，何谈建构共同的文学文化理想？又如何去寻找文学的普遍规律？我们必须摒弃逻各斯中心主义，否认有超越历史知识之外的普遍性知识和学理，强调无论西学还是中学都只是地方性知识，而全球化时代的学理只能在异质知识的对话之中产生。

其次，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挖掘、彰显文化异质性的目的不在于标榜自我，而是为实现互补互动，促进文化的和谐交融。异质性比较导致

的互补性是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导向总体诗学的有效途径。李达三先生指出：“丰富的东方文学传统在对待文学上，无疑具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积极的方式。对这些差异进行分析了解必将导致对西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某些观念提出质疑，……西方人士认为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文学观念和术语必将根据这种情况进行修正。”^① 所以，异质性比较一方面促使人们对自身文化文学观念的可靠性、合法性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促成对他种文明特殊价值的认识。“灯塔下面是黑暗”，孟而康先生曾在1983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引用此谚语来形容只研究本国文学是不够的。^② 确实，每一种文明如同一座灯塔，它的光亮有两大功能：既引来注目又照亮他者，尤其是自身存在的盲点需要彼此来照亮。互补才能共进，而最大的互补性来源于最大的异质性，只有先了解了每一种文化的文学特色，再让它们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互相借鉴，才能发展出健全的世界文学生态，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出世界文学真理。如果我们只以某一种文明圈的文学规律为模版来建构世界文学的普遍规律，则这种规律必然是残缺的、片面的。

再次，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在探寻文化异质性时要追根溯源，做到“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而不能只是罗列出各种相异的现象。在这一点上，叶维廉先生的“文化模子”论颇有启发性。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子”或语言“模子”，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加以对比，始可得到二者的面貌。^③ 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虽然运用实证方法追根溯源，但缺

① 李达三：《比较文学史》（序），朱徽译，曹顺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② 吴兴明：《理路探微：诗学如何从“比较”走向世界性》，《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

③ 叶维廉：《中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载温儒敏主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陷在于始终立身于自己的文化模子。由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基本上是在同一文明圈内比较，其思维模式，语言结构，修辞程序都同出一源，所以，文化“模子”的问题长期被遮蔽起来。“模子”问题的尖锐化是近百年间由于不同文明的正面冲击而引起的。在跨文明比较研究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当然，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要彻底了解一种文化只是一种理想。正如本尼迪克所指出的，文化超过它们特质的总和，我们可以对某一具体的文化特质了如指掌，却可能毫不理解一个为它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些元素的整体文化。可是，整体的文化研究又如何下手呢？本尼迪克建议可通过迂回的方式经济地实现对庞大的文化进程的了解。他以达尔文说明进化论的手段为例。当人类和他们的动物王国祖先的历史联系过于纠缠不清而不能用以确立生物进化论事实时，达尔文代之以甲壳虫组织结构及其进化过程，在这种比较简单的物质中，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生物进化事实。对文化的研究与此同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来得到启示。^①本书正是通过聚焦于在美华裔群体，展现来自不同文明圈的文化间的差异及其接触地带的种种文化互动样态，从而为全球化语境下庞大的文化进程带来启示。

最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追求一种“异中之和”或者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跨文明研究思潮在全球化浪潮的搏击中应运而生。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经济、文化的跨国大循环，在这个大循环中，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进行跨国界的整合，而各种区域文化势力自愿地或被动地卷入进来。全球化浪潮体现出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同质化趋势。“在全球化中，强势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成为一种范本被到处摹写，它的背后隐藏

^① [美] 本尼迪克：《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43 页。